

【区域协调发展】

十九大后我国区域发展新格局展望

李曦辉 李松花

摘要: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作了规范表述以来,时隔近40年,在党的十九大中首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新判断。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我们需要正视区域间、次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增长极区域分布存在的问题,并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推出为契机,形成平衡充分的区域发展模式。要按市场机制配置区域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统领,实现核心区域与非核心区域协同发展,各区域间互为核心、互为边缘,最终实现全国乃至国际区域间的经济平衡和充分发展。

关键词:不平衡不充分;资源配置方式;区域新格局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8)02-0014-10 **收稿日期:**2018-01-09

作者简介:李曦辉,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产业经济学会会长(北京 100081)。

李松花,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回顾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经从一个经济弱国发展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强国,产业竞争力、国际经济话语权等衡量经济实力的指标,都在与日俱增(李曦辉,2017)。在此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下面我们将研究党的十九大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转变后,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一、我国区域发展现状分析

1.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因新中国成立前日本对辽东半岛的侵占和上海各国租界的影响,当时大约全国70%的工业都集中在占国土12%的东部沿海地带。从产业分布情况看,当时重工业主要集中在辽宁中部地区,而机械修理和纺织等轻工业则主要分布在上海、无锡、天津和青岛等地。后来,由于备战等原因,我国工厂选址的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而且各地区也希望自给自足,从而造成了部分工业在各区域的重复性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业集中度,使工业在区域

间的分布有了很大的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制造业多分散分布于上海、江苏、辽宁、黑龙江、北京、湖北、河南、四川和陕西等东中部地区(文玫,2014)。

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工业又一次迎来了重新定位和聚集。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加深了部分地区经济的欠发达程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越发突出。以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作为区域主体,依照2012年测算的中国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全国平均工业化综合指数是66,总体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四大经济区域中,东部地区工业化水平最高,上海、北京工业化指数是100,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除河北(工业化综合指数为62)、海南(工业化综合指数为29)外,东部区域其他省份均进入工业化后期。东北区域辽宁(工业化综合指数为81)、吉林(工业化综合指数为66)也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而黑龙江(工业化综合指数为50)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部区域除内蒙古(工业化综合指数为67)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其余中部各省份均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西部区域除重庆(工业化综合指数为69)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之外,其余省份多处于工业化中期,新疆(工业化综合指数为32)和西藏(工业化综合指数为27)甚至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朱应阜,2013)。虽然近几年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中高速发展,但上述四大区域的工业化阶段基本没有变化,即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峻。

我们再看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人均GDP的情况。由于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与区域工业总产值的强相关性,工业区域化必然伴随着各区域收入的不平等。以2016年人均GDP为例,天津、北京和上海三大直辖市人均GDP均超过了11万元,位列前三,江苏、浙江、福建、内蒙古、广东、山东共有9个省份,人均GDP超过6万元,而相比之下人均GDP最低的甘肃省只有27508元,与天津相差3.2倍。也就是说,发达地区依然集中在东部区域,其他区域虽有局部人均GDP较高的省份,但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弱。

2.次区域内经济发展依然不平衡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为区域

间的不平衡,次区域内也同样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京津冀区域为例,区域内中心城市与其外围中小城镇或区域腹地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使京津冀区域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

首先,京津冀区域的产业结构差距明显,处于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2013年,北京市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经达到76.9%,经济已经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成为以服务业为主的世界级都市。天津市的发展水平虽然不及北京,但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为48.1%,已进入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50.6%)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而同年,河北省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较发达(所占比重为52.2%),第三产业发展仍较为滞后,所占比重为35.5%,经济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前半阶段(薄文广等,2017)。

其次,从产业链的分布情况看,北京的产业优势以高新技术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主,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天津经济发展正在由以石化、钢铁等传统制造业向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中,处于产业链的中端;河北省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均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其优势产业以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居多(薄文广等,2017)。更为严峻的是,近些年来,河北省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2000年到2013年的13年间,环京津的河北省钢铁工业产值增加了34倍,成为了全球第一钢铁大国中的第一钢铁大省(李曦辉,2017)。

再次,从人均GDP的角度来看,依据2016年统计数据,天津的人均GDP高居榜首,达到了115613元;北京的人均GDP则以114690元位居第二,仅比天津的人均GDP少了923元,二者不分伯仲,而河北省的人均GDP仅是42866元,即天津市和北京市的人均GDP是河北省的2.7倍,从中可以看出,京津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当然,次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是京津冀区域的问题,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所普遍存在的现象。一般情况下,次区域内市场化程度越低,那么该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越凸显,这也说明市场在进行资源配置和区域平

衡、充分发展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3. 极区域分布不支撑平衡充分发展

增长极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大对核心城市和区域中心的投资力度来刺激局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而后,该增长再通过滴流效应(trickle-down effects)辐射到周边欠发达区域。

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发祥地的广州和深圳区域,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带动珠三角区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直到2016年,广东省仍然是全国GDP总量排名第一,人均GDP也是在6万元以上的发达地区。但珠三角增长极对中国内陆地区的外溢效应却十分有限,只有约11%,而且主要集中在对中部地区的外溢效应上,对东北、西部地区的外溢效应则十分有限(潘文卿等,2008)。

到了20世纪9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上海、南京和杭州为代表的长三角经济增长极,长三角区域对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2016年,长三角区域创造了全国19.8%的经济总量、14.4%的固定资产投资、34.6%的进口总额、36.1%的出口总额和51.6%的实际利用外资。从产业结构来看,2016年,长三角区域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3.5:42.9:53.6,稳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长三角区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长三角26个城市城乡居居民收入均值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827元和8478元,是全国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朱玲燕,2017),但基本上仍处于自我循环式的发展状态(潘文卿等,2008),与我们所期待的对内陆地区的外溢效应相去甚远。

当前,京津冀区域作为中国第三个经济增长极,其综合优势远超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薄文广等,2014)。京津冀城市群的土地面积为21.6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的2%,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资料显示,京津冀城市群总人口1.1亿人,约占全国的8.1%;GDP为66474.5亿元,约占全国的10.4%;产业增加值为47304.5亿元,约占全国的7.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6197.2亿元,约占全国的9.6%;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4114.3亿元,约占全国的8.6%。但如上文中所述,即使在京津冀次区域内,发展也很不平衡,对于区外地区的协同带动作用更是有待释放。

虽然这些经济增长极都为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期待的对欠发达地区的辐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因为这些增长极的分布不均衡,加深了与远离这些经济增长极的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通过改革开放,尤其是1987年中国提出经济发展三步走总体战略以来,发展至今,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小康。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未来30年的发展蓝图,还提出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由于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如何实现各区域人民的共同富裕仍是个艰巨的考验。要想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我们有必要首先在理论上厘清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成因,进而采取对应措施,构建更趋优化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二、基于资源配置与分工理论视角对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分析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起初也许只是“历史的偶然性”。也就是说,一个产业在哪里群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初的商人是在哪里做起的。例如,尽管英国曾是欧洲工业的领袖,但那早已成为过去式。早在1990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只是德国的66%,也不及法国和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曾忠禄,1997)。而伦敦之所以到目前仍是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它过去就是。意大利著名的瓷砖生产聚居区——萨索尔洛最初也无生产瓷砖的有利条件,起初生产瓷砖用的原料(白黏土)和设备都依靠进口。越来越多的瓷砖生产企业聚集萨索尔洛,是因为那里最先有了一些生产陶器的企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A.马歇尔提出的那样,当一个行业为自己选定一个地方以后,它就可能长久地呆在那里:因为从事同一技术行业的人们从彼此的邻近所获得的好处是如此之大(Marshall, 1948)。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起因我们很难去考证,但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不断得到加强是有其深层次的经济理论根源的。有关于此,西方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曾说过,经济史向我们揭示,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不是靠政府逐渐放松对经济控制

的结果;相反,它需要政府有意识、强有力地干预才能实现(Ckarl Polanyi,1994)。正是沿着上述理论轨迹,百废待兴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战略背景下,政府适时地进行了经济干预,对相对更具发展潜力的区域采取了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政策措施,使东部地区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

但另一方面,因为经济发展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所以即使中西部区域获批同样的政策,也很难取得当今东部区域的经济成就。

其实,经济学家对生产力区域布局和产业分工早有深入的研究,分工理论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其成名作《国富论》中讲到,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Adam Smith,2010)。我国东部地区自古市场化程度就相对较高,社会分工相对精细,具有较好的工业化基础。贝蒂尔·奥林认为,只有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或拥有较高的运转原料(不是食品)的方便程度,具有这样条件的地区才适宜建立企业进行生产(Bertil Ohlin,2001)。我国东部地区大多沿海,区位及运输成本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使得加工业、服务业等企业落户于东部地区的意愿更为强烈。

根据规模与范围效益理论,上述分工原理又进一步对区域产生了集聚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当市场很小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从事比较专业的职业。市场发展过程中分工是不可获取的因素,而分工又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只有分工与市场规模同步发展,才能促进经济繁荣。马克思也曾对市场规模与范围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从创新成果扩散的视角提出,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奥林则认为,当每个人从事于大

量生产某一特定物品,而不是合作生产少量的多种不同物品时,其结果会增进技术和节约时间。一个地区不可能在生产一切商品方面都优于其他地区,亦即是这一地区不可能以比较低的货币成本生产一切商品。大规模生产的节约加强了生产的国际分工趋势,这种国际分工是由生产要素的不同配备而产生的(Bertil Ohlin,2001)。也就是说,只有分工协作才能促进市场发展,进而形成市场规模,并且产业优势一旦形成,它便具有自我加强的内生机制,即区域产业优势越明显,就越能集聚更多相关企业的加入,从而使得该区域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这种产业的集聚效应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据一项对国外投资影响的统计研究发现,在对外商有吸引力的区域,群集存量每增加10%,该区域被未来投资者选中的可能性就会增加57%(K.Head et al,1995)。以天津为例,可口可乐公司进入天津开发区后,吸引了美国容器公司;摩托罗拉进入开发区后,吸收了美国绿点公司、模泰公司、英国氧气公司、韩国的富川、新加坡的富裕、日本的三井等高科技公司纷至沓来,到天津开发区聚集(王志乐,1996)。

这种分工、规模与效益的经济规律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上述产业集聚方面,还体现在人力资本方面。首先,随着产业的集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会逐渐提高。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和兰开斯特曾把产业集聚带来的知识传播比喻为传染病的蔓延,人际间接触面越广,接触频率越高,传播速度就越快,传播得将会越彻底(E.K,Y.Chen ed,1994)。其次,产业集聚除了对人力资本带来知识溢出效应外,还将推动人力资本更趋专业化。产业集聚导致该区域对于某类劳动力更具吸引力,而且也相较其他区域,更容易在该专业相关领域就业,有利于强化人力资本的专业化发展。而这种区域人力资源的提升,将进一步强化该区域在产业集聚方面的优势,随之便产生了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

三、十九大后我国区域空间新格局的变化趋势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各项资源差异显著,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区域间、次区域内和增长极分布不均衡不平衡现象,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一直是我們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国家始终把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列为其六项具体实施内容之一。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产业发展也呈现出更加区域化的态势,区域尺度越来越成为承载产业集群、实现规模经济的理想载体。而经济区域化也有利于将更多地域性的行政垄断,转化为由市场来调配资源,使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更具效率。若想形成区域经济支撑经济发展的态势,那么对我国区域空间新格局的未来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1. 围绕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培育点线面平衡发展新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陆续提出区域发展的三个新的经济增长带(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到现在,其重要性越加凸显。党的十九大后,“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写进党章,京津冀地区被定位为全国协同发展机制体制改革先行区,长江经济带则被确定为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带。我们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充分肯定区域发展已经取得的成绩,也要正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论者指出,京津冀距离区域协同发展成熟度目标值差距甚远(龚晓菊,2016),长江经济带的统一大市场也远未形成(周芳,2014),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部分省市竞争激烈,所以在国际通道建设上已经出现了重复投资的现象(柳建文,2017)。而学界对于区域协同发展方面虽然已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多局限在各级政府如何作为方面,例如,放松政府管辖权、加强各级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构建政策网络机制、强调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和其他以政府主导的视角提出的区域协同发展对策等。

随着区域协同发展的推进,各区域间的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仅靠行政手段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而且从三个新的经济增长带的发展情况看,尽管基本上都已确立以机构设置、联席会议制度、部门间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调控机制,但在解决区域协同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难题

时,仍受到很多挑战。而且,有些行政调控手段的实行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成本,难以频繁使用。例如,行政区划调整涉及政府机构的调整、干部的任免、属地关系的变化等(柳建文,2017)。有论者也指出,过多采用行政调控手段可能带来“反调控”效应。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区域问题,有些区域还提出以政府为核心的“区域管治”理念。这种区域发展思路,不利于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最终区域协同成了政府的“独角戏”。

若想从根本上推进形成三个新的经济增长带,形成“点、线、面”区域平衡发展的全国样板,我们急需从一切以政府为主导的思维模式中转变过来。哈耶克论行政机构过度行使职能时曾提出,所有的经验都确证了英美经验所表明的结果:行政机构实现他们认为迫切的目的的热情,会使它们看不清它们的职能,而且还会致使它们认为宪法对它们的限制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在面对他们热情努力实现其所认为的最重要的政府目标时,都应当让路(Hayek,1997)。近20年来,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水平和能力的提高为世界所称道。但也总是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求效过切,因而变动频繁,甚至仓促出台,力度不当,欲速不达、事与愿违等(金碚,2013)。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将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为“市场增进者”(Market-enhancing),并且认为,随着经济日趋成熟,民间部门解决富有挑战性的协调问题的能力有了提高,政府政策的运用范围将逐渐受到限制(青木昌彦,1998)。

本文认为,解决区域协同发展的问题,要按市场机制配置区域资源、按分工原理进行经济活动。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奥林早就说过,一个地区自然不可能生产那些需要以该地区不存在的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的产品。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那些所需生产要素在该地区比较丰富的产品,而最不适于生产需要某些生产要素占很大比例的产品,而这些要素在该地区内存量很少,甚至没有(Bertil Ohlin,2001)。优化产业在区域间的布局,实现经济协同发展,其核心是产业结构的优化。除了基于区域资源禀赋,进行产业布局之外,我们也要审时度势,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出发,运用市场机制,重新规划区域

产业结构布局。而且,三个新的经济增长带互为依托、互为促进的内在联系也需要我们更加强化市场在配置资源、产业布局方面的作用,以推进实施区域协同发展。

有论者指出,“一带一路”是顶层战略,其功能、地位远高于国内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战略,并对区域发展战略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同时区域战略对“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刘慧等,2017)。而为突出“一带一路”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引领带动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也就是说,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为重点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对于实现我国区域协同发展,乃至落实“一带一路”中国倡议意义重大。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无疑都将有助于扩大市场范围、追求市场规模与范围效益,并进一步优化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六大经济走廊将可与另两大区域战略形成互为促进的关系。以“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系为例,“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将京津冀地区与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紧密联系起来,密切了京津冀地区与东北地区和内蒙古的联系,无疑为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和开放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广阔的市场,扩大了京津冀地区的带动辐射作用;另一方面,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都市区功能,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开放与合作提供强大的支撑平台(刘慧等,2017)。而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区域因优越的地理优势,长江经济带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中央从不同的高度出发,根据不同的区位特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其实质来讲都为区域协同服务,即通过不断在境内乃至在境外扩大核心区域的辐射范围,使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区域间分工更具效率,进而促

进规模与效益优势不断得到释放,最终实现区域间协同发展。

2.从高速向高质量转化 促进区域间平衡充分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列为其具体实施战略内容。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型体系、乡村振兴战略对于我们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是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是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不断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曾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重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着重强调。虽然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却没有改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这意味着,政府未来将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体制结构等诸多方面对于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主抓内容会有所调整。与之相伴而来的将会是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将会有更大的作为。

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可以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供给侧改革中的经验,但也要结合我国国情,例如我国与西方提出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不同,我国没有严重的“滞胀”,经济增长速度仍较高,而且通货膨胀率也始终在可控范围之内。而结构性和体制方面,却有待进行深入地改革。只有通过将资源配置的权利更多地让渡给市场,才能使资金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生产的产品更符合

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只有市场更具活力,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规模与效益的正外部性,强化核心城市对非核心区域的辐射作用。

二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除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也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就是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去改造生产关系。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各项创新基础比较薄弱,虽然近些年来也取得了一些如超级计算机、无人机等科技创新领域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追赶”状态,所谓的“创新”,理解为“模仿”+“改良”可能更为贴切。这是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主要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以低要素成本优势进入全球贸易体系。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所承担的风险较低,投入也相对较少,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后发优势,并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但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而面对的新矛盾,需要我们在“追赶”的同时,更要通过真正的创新,跨过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实现“弯道超车”。

我们既要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创新驱动型,也要转变创新驱动路径,要更加注重促进创新成果向欠发达区域的转移,扩大创新成果的溢出效应和辐射范围。如上所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各个区域发展水平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我们不仅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处理僵尸企业,也要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方式将产业高级化、区域分工和定位更加合理化。在充分发挥各项创新优势,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更要通过区域联合机制、产业联盟机制、企业合作机制、人才交流机制助力区域间协同发展。例如,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区域已经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发达地区要继续发挥其在发展创新方面的排头兵作用之外,更要在创新成果后续转化、实施维护等方面加强与欠发达区域的协作,使该创新成果转化为欠发达区域吸引专业人才的吸铁石,助力欠发达区域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进而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目标。

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已为时不远,而我国仍是一

个拥有近6亿农村常住人口、且城乡区域差异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补齐短板,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标准,我国也同大部分国家一样采取了城镇化战略。资料显示,世界各地的城市人口比例从1960年的33%上升到2016年的54%。我国基础相对薄弱,但发展速度却很快,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36%左右,到2016年末已上升到57.4%,但随之而来的乡村衰落却不能忽视。即使在部分乡村地区的人口在缓慢增长,其活力也已越来越小。每年都有上亿农村人口,且其中大多数是青壮年流动到城市,导致农村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而事实上,城市与乡村本应是一个有机体,二者均应实现可持续发展,并相互支撑。中央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所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次提到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列为重大经济发展战略之一。毋庸置疑,“乡村振兴战略”是涵盖社会、经济、生活、生态等做多方面的综合战略,但为了实现振兴乡村的目标,正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我们首先要实现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必须以产业振兴为依托。

振兴乡村产业,首先,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加大农业领域的科技投入,早日建议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并培育更多的规模化经营模式,以实现市场规模与效益的不断优化升级。其次,除了进一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之外,还要着重建设乡村地区高素质人才队伍,以提升农民适应市场及预测市场的能力,并使农民有能力延伸农业产业链,进行适度规模化初级加工和深加工。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促进与旅游文化等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提高乡村经济的附加值。人们常常以机械论的观念讨论产业的附加价值,似乎技术密集度低的传统产业就是“低附加值”产业,技术密集度高的所谓高技术产业就是“高附加值”产业。其实,在现实中并没有这样的绝对区分。真实的情况是:别人不会生产而我会生产的产品,或者别人做得没有我好的产品就是高附加值的,尽管它可能属于传统产业;相反,我会生产而别人也会生产甚至有能力做得比我更好的产品,一定是低附加值的,尽

管它可能属于高技术产业(金碚,2013)。也就是说,乡村地区完全可以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创造有特色的产品,形成高附加值的产业。只有在乡村地区成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且有相应的人力资本能够支撑其后续发展,才能使乡村得到真正的振兴,才能实现城乡区域间的协同发展。

四、展望

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正视区域间次区域内、增长极分布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战略,使各区域在新时代能更加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更具效率的分工,使非核心区域与核心区域相比,只是在为中国伟大复兴中所承担的分工定位不同,而无发展的巨大差距。政府只有进行适度的调控,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使经济发展得以在其内在客观规律下健康成长,而不是被人为强力干预而偏离正常轨迹。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发展模式,更有助于核心区域与非核心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实现互为核心、互为边缘,即所谓边缘非边缘、核心非核心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全国乃至国际经济平衡和充分发展。

参考文献

- [1]李曦辉.民族经济研究[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7.
- [2]文玫.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聚集[J].经济研究,2004,(2).
- [3]朱应泉.中国欠发达地区双重内生工业化研究兼论旅游产业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4]薄文广,陈飞.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与困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 [5]李曦辉.“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雄安新区关系研究[J].河北学刊,2017,(9).
- [6]潘文卿,李子奈.三大增长极对中国内陆地区经济的外溢性影响研究[J].经济研究,2008,(6).
- [7]朱玲燕.长三角城市群保持稳增长态势[J].中国国情国力,2017,(9).
- [8]薄文广,周立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经验借鉴及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启示[J].城市,2014,(5).
- [9]曾忠禄.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J].南开经济研究,1997,(1).
- [10]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J]. New York, N. Y.: Macmillan, 1890, reprinted, 1948.
- [11]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 [12]Adam Smith.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13]Bertil Ohlin.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 [14]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 [M]. Hampshire : Harri-man House,2007.
-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K. Head et al.,“Agglomeration Benefits and Location Choi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38(1995).
- [17]王志乐.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 [18]E. K. Y. Chen ed., Technology Transfer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18, London&NewYork, 1994.
- [19]龚晓菊.北京与环首都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6,(21).
- [20]周芳.长江经济带志在统一大市场[J].第一财经日报,2014-11-17.
- [21]柳建文.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转型[J].天津社会科学,2017,(5).
- [22]北京人大编辑部.警惕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反调控”[J].北京人大,2015,(9).
- [23]广东省人民政府.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C].2005.
- [24]汪伟全.区域合作中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J].政治学研究,2012,(2).
- [25][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26]金碚.稳中求进的中国工业经济[J].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3,(8).
- [27]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 [28]刘慧,刘卫东.“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关系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4).
- [29]李国祥.乡村振兴战略:“村镇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N].21世纪经济报道,2017-10-19.

The Prospect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New Pattern after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Li Xihui Li Songhua

Abstract: Since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in 1981, after a lapse of nearly 40 years, a new judgement has been made to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in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is "with entering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our country have transformed into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ever-growing need for a better life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olve the major problem of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need to face up to the regional, sub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balance and the growth pole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problems.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launch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Belt and the Roa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e should face the contradiction and launch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model fully. It is necessary to allocate region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 Belt and the Roa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ore area and the non-core area. All the regions are mutually core and mutually marginal, that is, the so-called non-edge and edge, non-core and core development mode, so that, we can ultimately realize the interregional economic balance, full development in nationally and even internationally.

Key Words: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 Regional New Pattern

(责任编辑:晓 力)

- ☆ 汇聚区域城市发展最新观点
- ☆ 把握区域城市发展最新动态
- ☆ 做好区域城市发展参谋助手

欢迎订阅2018年《区域与城市经济》

《区域与城市经济》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依托学界专家把关,每篇文章精选自全国三千余种报刊。本刊面向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及专业研究人员,提供区域经济规划、城市经营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指导、决策参考。

《区域与城市经济》设有如下栏目:

理论研究、学科建设、战略与规划、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经济发展、空间经济、城镇化与城市群、管理与政策研究、比较与借鉴、研究述评、专题(如:"一带一路"经济、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振兴、长江经济带、西部开发、主体功能区、创意城市、资源型城市等)。

《区域与城市经济》为月刊

大16开128页

单价:26.00元

年价:平装312.00元

合订402.00元。

订阅方法:

订阅热线

010-82503412, 82503440, 82503029

传真:010-62512319

联系人:市场部

邮局汇款

收款人:市场部

地址:北京9666信箱

邮编:100086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人大支行

户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账号:344156031742



微信支付



支付宝支付